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的诗僧别集批评

李舜臣¹, 欧阳江琳²

(1. 武汉大学 文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2; 2.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, 南昌 330022)

[作者简介] 李舜臣(1972-), 男, 江西永丰人,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,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 主要从事古代诗词研究; 欧阳江琳(1974-), 女, 江西彭泽人,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 文学博士,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歌研究。

[摘要]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集部收录了 37 种诗僧别集和四部僧诗总集, 并对这些诗僧的品性、创作得失作了扼要评价。这些批评虽存在若干偏颇, 但基本上能做到持平公允, 考辨精微, 代表了古人对诗僧创作的总体认识和估价。

[关键词] 四库全书总目; 诗僧; 僧诗

[中图分类号] I206.2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6)05-0571-05

《四库全书》(包括存目)收录了唐代至清初 34 名僧人的诗文别集和四部僧诗总集, 是古代收录僧人诗作最多的一部丛书。其收书情况如下^①:

别集		唐	宋	元	明	清	总计
	著录	3	7	5	2	0	17
总集	存目	0	1	1	11	7	20
	著录	0	2	0	1	0	3
集	存目	0	0	0	1	0	1

这 41 种诗僧别集和总集, 基本反映了清代以前诗僧创作的总体成就。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(以下简称《总目》)里, 四库馆臣还分别对这些僧诗集撰写了提要, 扼要介绍了作者生平、著述源流, 指陈其创作得失。若将这些提要综括起来, 则堪为一部简明的古代诗僧、僧诗批评史。本文以《总目》诗僧别集、总集提要及相关材料为基础, 试图归纳出四库馆臣对诗僧及其诗歌创作的总体评价。

一

诗僧, 即指会写诗的僧人, 这似乎无须辨明。可是, 历史上游移于僧俗两界者, 实在不少, 有的半路出家, 有的老来还俗, 还有的虽剃了头, 骨子里与俗人无异。所以, 人们在界定“诗僧”这一概念的内涵、外延时, 意见往往很难统一。即今而言, 学界对“诗僧”的界定, 大概有两种说法; 其一认为, 诗僧指专业写诗的僧人, 也就是“披着袈裟的诗人”^[1] (第 126 页); 其二认为, “凡是信仰佛教的诗人”都可称作诗僧, 既包括出家的僧人, 也不排除“居士诗人和在家修行的诗人”^[2] (第 43 页)。这两种说法, 分别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, 似乎都有道理。但仔细思量, 又不周全。前者指出了诗僧的特长是写诗, 但对僧人身分的界定尚不明确; 后者, 从大乘佛教的精神出发, 似乎更贴近中国佛教发展的实际, 但将居士诗人也纳入到诗僧这一群体内, 则又过于宽泛, 反而模糊了诗僧的“本来面目”。

关于这个问题, 古人似乎也很难拿准。《总目》就多次批评前人在界定诗僧身分时的一些错误做法, 比如:

《古今禅藻集》提要: “中间如宋之慧休、唐之无本, 后皆冠巾仕宦, 与宋之道潜老而遭祸、官勒归俗者不同。一概收之, 未免泛滥。”^[3] (卷 189 第 1724 页)

《唐僧宏秀集》提要：“采摭颇富，而亦时有不检。……至贾岛始为浮屠，名无本。周朴始为浮屠，名清塞。后岛遇韩愈，劝返初服，仕至长江簿。朴为姚合所赏，亦加冠巾，黄巢之乱，抗节骂贼而死。其人在士大夫中亦卓然不愧于儒者。彙乃录其诗四十五首入此集，亦为不类。”（卷 187，第 1 700 页）

《唐四僧诗》提要：“清塞即周朴，其人后返初服，不应列为四僧。”^[3]（卷 186，第 1 690 页）

这里，有必要略述其中所及僧人之生平，方能明确四库馆臣衡鉴诗僧身分的原则。“宋之慧休”，据《宋书·徐湛之传》，他本姓汤，早先入沙门，然宋孝武帝命其还俗，官扬州从事史^[4]（卷 71，第 1847 页）。“唐之无本”，即中唐著名诗人贾岛，早年亦出家，法名无本；但后来在韩愈的劝说下返俗，官长江主簿。从这两人的经历看，他们皆是因尘俗之诱惑而自愿还俗的。而道潜，即与苏轼关系甚密的参寥子；及苏轼谪迁岭南，他亦坐罪，且被官府勒令还俗，后勒令解除，复祝发为僧。虽同为半途还俗，然道潜实非出于本心，与慧休、贾岛二人有本质区别，故馆臣认为慧休、贾岛不应与道潜一样，被收录在僧诗选本中。后二则提要里，馆臣竟将清塞误为周朴，余嘉锡先生尝力辨之。这里姑且不论其疏舛，但很明显，他们同样认为清塞“返初服”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，故亦不应以“诗僧”目之。

由以上三则提要可以看出，四库馆臣是持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界定诗僧的，将那些虽曾出家但后来又自愿“返初服”、“复冠巾”的诗人，排除在诗僧之外。而对于所收诗僧别集之作者，《总目》一般从释家习惯，皆明确冠以“释”或“僧”之姓。

对于那些虽未脱袈裟，但处处行藏俨然非僧家所为者，馆臣亦不将其视为诗僧。比如明初姚广孝，少时即出家，僧名为道衍，但后为朱棣谋逆所用，终官至资善大夫太子少师，封荣国公，位极人臣。《总目》著录其《逃虚子集》，署名为“明姚广孝”，而非“明释道衍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馆臣也没有将今人普遍认定的唐代僧人寒山子视为诗僧。《总目》著录《寒山子诗集》时，未能冠以“释”或“僧”之姓；又，《白莲集》提要说：“唐代缁流能诗者众，其有集传于今者，惟皎然、贯休及齐己。”^[3]（卷 151，第 1 304 页）亦无寒山子之名。在馆臣看来，寒山子之诗虽“全作禅门偈语”，但因其“踪迹甚怪，盖莫得而考证”^[3]（卷 149，第 1 277 页），故不当在“缁流”之列。

从历代诗僧的情形看，《总目》在鉴别诗僧的身分时所持的审慎态度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释子作诗，始于六朝。东晋有“援笔挥翰，以慰二三之情”的支遁，复有在庐山集僧人、居士吟咏唱和的慧远，稍后又有帛道猷、宝月、宝志等人，皆为僧人作诗的较早代表。但那时尚未以“诗僧”来称呼这些释家诗人。“诗僧”一词的发明权，似应归于中唐诗僧皎然，其《杼山集》有两处出现“诗僧”一词。一处在卷四诗题《酬别襄阳诗僧绍微》中；另一处在卷九《与权从事德舆书》中：“灵澈上人足下，素识具文章，……自齐梁以来，诗僧未见其偶。”^[5]（卷 9，第 860 页）与皎然约略同时的刘禹锡《澈上人文集记》中亦云：“……乃抵吴兴与长老诗僧皎然游……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，灵一导其源，护国袭之；清江扬其波，法振沿之。如么弦孤韵，警人耳目，非大乐之音。独吴兴昼公，能备众体。昼公后澈公承之，……可谓入作者闾域，岂独雄于诗僧间邪？”^[6]（卷 19，第 244 页）“诗僧”一词在此文三见，足见刘禹锡已有较明确的诗僧观念。这几则材料里所提到的“诗僧”，像皎然、灵澈、护国、清江、法振，都是当时善于作诗的僧人代表，他们既无半途还俗之经历，更不同于一般士大夫诗人，而是以诗为名的出家僧人。这与《总目》中的观念，就十分接近了。

当然，馆臣对诗僧之界定亦有前后矛盾、不甚周全处。即以周贺为例。余嘉锡先生云：“……贺平生所作诗，多作于为僧之时，其集之行世者，又或直题清塞之名，未及一一追改，故选僧诗者得而录之。若贾岛官至长江簿，以官名集，其诗又皆作贾岛，无追题其无本之名者，故不得而阑入之，是亦《春秋》名从主人之义也。昔梁刘勰出家，改名慧地；宋饶节为僧，改名如璧；而《南史》勰本传及吕居仁《江西宗派图》皆仍用其本名，以其著述成名，在未为僧之前故也。周贺少而出家，老始还俗，为僧之日长而为士人之日短，故《诗人主客图》及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唐才子传》皆直名之曰僧清塞，李肇列入唐僧之中，初非漫然无所据者，不可谓之自乱其例也。”^[7]（卷 24，第 1 577 页）不称刘勰为诗僧或文僧，已是一般共识；而饶节则当加讨论。《四库全书》收录其《倚松老人集》二卷，集中之诗大半为僧后所作，但馆臣为该集署名时，仍是“宋饶节”，而非“释如璧”。可是，在《古今禅藻集》提要中又说：“宋倚松老人饶节，后为僧，名如璧，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称为南渡诗僧之冠，与葛天民卒返初服者亦不同，乃漏而不载。”^[3]（卷 189，第 1 724 页）显然互相抵牾，难以自圆其说。倒是余嘉锡先生以诗人本身之意愿及为僧时日之长短，来定夺其为“诗僧”与否，似更灵活、通脱一些。

二

佛教又称“沙门”，出自梵语，其意为“息心”、“净志”，而这正是佛教的根本法门之一。佛门为弟子制定了大量的清规戒律，令其割断尘缘，绝情遗世，永离斗争之风。而那些谨持戒律，潜心修行的僧人，历来也为宗门所尊崇。《总目》对那些严守戒律的诗僧，同样予以了较高的评价。如诬宋僧重显云：“戒行清洁，彼教称为古德，故其诗多语涉禅宗，与道潜

慧洪诸人专事吟咏者蹊径稍别。然胸怀脱洒,韵度自高,随意所如,皆天然拔俗。”^[3](卷152,第1313页)

然而,受中土文化的影响,特别是中国化的禅宗出现之后,佛教超脱、清静的传统逐渐发生了变化,不少僧人在世俗诱惑和自身欲望的驱遣下,很难安心于清苦之佛门。他们或结交高官显宦、帝王将相,甚至陷入是非纷争之中;或拈花惹草,染上了不少风流韵事,显示出卓特、怪异之个性。在宗门,这些僧人一般会被视为“异端”。《总目》对那些逸出宗门轨范的诗僧,也基本持贬斥态度。比如北宋著名诗僧慧洪,出入公卿门第,以医术交结张商英,又游郭天信之门,后来张、郭得罪,他亦被连累,发配至岭南。而其作诗亦“不避绮语”,据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记载,他作《上元宿岳麓寺》诗,有“十分春瘦缘何事,一掬乡心未到家”句,被蔡卞之妻讥为“浪子和尚”^[8](第318页)。故馆臣对慧洪的僧品,多有微词,说他“既役志于繁华,又溺情于绮语,于释门戒律实未精严,在彼教中未必据为法器”^[3](卷145,第1238页)。再如,清初岭南诗僧大汕,品行尤为怪诞,蓄优伶,好饮酒,结交尚可喜等权贵,富甲一方,所作之诗亦多绮语,故被文士潘耒、屈大均斥为“狂僧”、“花怪”。四库馆臣不仅将其所著《离六堂集》予以禁毁,而且还对其品行进行严厉批评。大汕曾删元人李祜《云阳集》,馆臣评曰:“大汕虽号方外,实权利之流,其学识不足知禪,去取深为未当。”^[3](卷168,第1459页)

佛门弟子为维护佛教的生存状况,还经常与儒士发生论辩,《总目》对这些诗僧也予以了激烈批评。如北宋僧人契嵩在当时丛林中地位颇为尊崇,被宋仁宗赐号为“明教大师”,著《传法正宗记》、《传法正宗论》,为禅宗世系正名分、定宗谱。但除此之外,契嵩于佛教史之突出意义更在于他援儒入佛、等同佛儒之思想。为此他写了不少文章著作,诋毁抗辩。馆臣一方面称颂契嵩“博通内典”,另一方面则批评他“不自参悟其义谛,乃恃气求胜,哓哓然与儒者争。尝作《原教》《孝论》十余篇,明儒释之一贯,以与当时辟佛者抗;又作《非韩》三十篇,以力诋韩愈;又作《论原》四十篇,反复强辨,务欲援儒以入墨,以儒理论之,固为偏驳。即以彼法论之,亦嗔痴之念太重,非所谓解脱缠缚、空种种人我相者”^[3](卷152,第1313页)。馆臣对契嵩的批评,一方面固然因其自身好争之性格,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还是为了维护儒家的独尊地位。

明清之际,很多遗民文士为全志节、远祸害,皆纷纷遁迹空门。这些遗民出家后,有潜心奉佛而成为佛门龙象者,有不求闻达终老林壑者,但更多的是明着袈裟而暗事反清者。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,清廷对遗民僧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政策。乾隆在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·圣谕》中有一段方针性的言论:“……金堡、屈大均则又遁迹缁流,均以不能死节,腴颜苟活,乃托名胜国,妄誓狂言,其人实不足齿,其书岂可复存?自应逐细查明,概行毁弃,以励臣节,而正人心。”^[3](第3页)金堡,即永历朝中著名的“五虎”之一,铁骨铮铮,直声倾动南天。顺治七年因党祸落难,削发出家,更名为今释,号澹归。遁迹空门后,他深陷于法缘与俗缘的反复纠葛中,一方面苦行精勤,构建别传禅寺;另一方面,又时与明遗民相往来,复攀附尚可喜,为其撰家谱《元功垂范》,一时为士林所耻。屈大均,于顺治七年广州破后,礼岭南高僧道独为师,法名今种,号灵一;然几年后又弃禅归儒,进而大肆辟佛,为佛门所不容。由金堡、屈大均出家之经历,盖可见清初明遗民逃禅之复杂,亦凸现出“天崩地坼之日”士人之悲哀。

如果说,金堡、屈大均出家后的复杂行止尚为乾隆压制他们落下“妄誓狂言”的话柄,那么,清初其他戒行精严、操守高洁的诗僧别集亦为馆臣所禁毁,则全然出于政治的原因。比如,岭南高僧函可,号剩人,顺治四年至南京请藏经,适遇清兵屠城惨状,遂作私史《再变纪》,为城逻发现,受尽酷刑后被发配东北;在那里,他与遗民志士砥砺志节,结冰天诗社,抒写“东西南北之冰魂,洒古往今来之热血。”^[9](卷20,第598页)而其《千山诗集》,则更是血泪成篇,披肝沥胆,控诉着时代之罪恶。再如函昆,字天然,号丹霞老人,洞宗第34代法嗣,其主持下的广州海云、海幢诸寺,为明遗民重要之聚散地,其诗集《瞎堂诗集》“于殉难诸臣,多有诗哀婉”,黍离麦秀之思,深深悲怆。正因为此,馆臣皆以二人诗集“有违碍语”或“有抵毁本朝者”而禁毁之。此外,岭南诗僧成鹫《咸陟堂诗文集》、今无《光宣台集》等,亦同样由于这种原因而禁。这表明,四库馆臣并不纯然以学术眼光编修书籍,初衷实是欲从思想上钳制汉族文士,其骨子里始终有一个政治影子作怪。

三

由于僧人的精神信仰、思维方式、生活境遇与士大夫相比有着很大差异,故诗僧的创作常显示出特有的精神风貌与艺术气象。自宋代以来,诗评家在品评他们的人格及诗格时,常示以别样的眼光,褒贬不一,见仁见智。如宋人叶梦得云:“近世僧学诗者极多,皆无超然自得之气,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,又自作一种僧体,格律尤凡俗,世谓之酸馅气。”^[10](第425、426页)而清人钱谦益却说:“古人以苾刍喻僧。苾刍,香草也;蔬笋,亦香草之属也。为僧者不具苾刍之德,不可以为僧;僧之为诗者,不谙蔬笋之味,不可以为诗。”^[11](卷48,第359页)此二则评说,大异其趣,基本代表了古人对僧诗的两种批评倾向。那么,四库馆臣又是怎样评价僧诗的呢?

从总体上看,《总目》对僧诗的评价都不太高。如评中唐著名诗僧皎然《杼山集》谓:“在中唐作者之间可厕末席,集未附载,立数篇,聊聊以各体,非其所长矣。”其实,皎然的诗名影响甚大,王昶评曰:“师主兴制,故律尚清壮,其或发明玄理

则深契真如,又不可得而思议也。”^[13](第776、777页)严羽亦说他“在唐诸僧之上”^[12](第698页)。相对而言,《总目》的评价显然偏低。又评:“唐代缁流能诗者众,其有集传于今者,惟皎然、贯休及齐己,皎然清而弱,贯休豪而粗,齐己七言律诗不出当时之习,及七言古诗以卢仝、马异之体,缩为短章,诘屈聱牙,尤不足取。”^[13](卷151,第1304页)这里一并指出了唐代三位最杰出的诗僧各自的缺陷。馆臣的这种评价,反映了历来人们评价诗僧及其诗作的主要倾向。在以往的诗歌选本、总集、以及诗歌纪事类的著述中,诗僧及僧诗大多单独列出,附于末席。《四库全书》集部虽没有沿袭此种做法,但子部释家、道家类撰述仍列于末尾,可以看出,馆臣对释家著述实际仍存有一定的偏见。

不过应肯定的是,《总目》在评价僧诗时,除因政治因素对明遗民诗僧一概抹杀外,基本还能持较为公允、平正的态度,力避偏颇之论。像慧洪,《总目》一方面指出了他“求名过急”、“好为绮语”等恶劣僧品,另一方面对其诗又有较高评价:“要其诗边幅虽狭,而清新有致,出入于苏、黄之间,时时近似,在元祐、熙宁诸人后,亦挺然有以自立,固未可尽排也”^[13](卷154,第1331、1332页)。又如评道潜《参寥子集》云:“《冷斋夜话》称,参寥性偏,憎凡子如仇。今观其诗,如《湖上》二首之类,颇嫌语少含蓄,足为傲僻寡合之验。然其落落不俗,亦由于此。……此老诗风流蕴藉,诸诗僧皆不及。”^[13](卷154,第1331页)不因人废诗,显示出馆臣较为通脱的眼光。在具体分析某位诗僧的创作得失时,《总目》也基本能褒贬平衡,既不全盘否定,也不盲目追捧。像评齐己,既说其七言“诘屈聱牙,尤不足取,”又对其五律、绝句评价较高:“五言律诗居全集十分之六,虽颇沿武功一派而风格独迥,如《剑客》《听琴》《祝融峰》诸篇犹有大历以还遗意,其绝句中《庚午年十五夜对月》诗……惓惓故君,尤非他释子所及”^[13](卷151,第1304页)。又评宋释文珩《潜山集》:“其诗多山林闲适之作,比兴未深,而即事讽谕,义存劝戒,持论率能中理。”^[13](卷164,第1406页)

《总目》在评价僧诗时,有一个明显特征,即多次涉及“蔬笋气”、“酸馅气”两个术语。比如:

宋释道璨《柳塘外集》提要:“其诗边幅颇狭,未能脱蔬笋之气。而短章绝句,能善用其短者,亦时有清致。”^[13](卷165,第1411页)

宋释居简《北磬集》提要:“居简此集,不摭拾宗门语录,而格意清拔,自无蔬笋之气。”^[13](卷164,第1405页)

元释大诰《蒲室集》提要:“然其五言古诗,实足揖让于士大夫间。余体亦不含蔬笋之气,在僧诗中犹属雅音。”^[13](卷167,第1436页)

清释本盛《直木堂诗集》提要:“其诗不作禅语,绝无僧家蔬笋气。”^[13](卷181,第1635页)

《总目》所用这两个术语,其实也是前人评价僧诗时经常用到的。据周裕锺先生考证,“蔬笋气”、“酸馅气”最早见于苏轼《赠诗僧道通诗》中“语带烟霞从古少,气含蔬笋到公无”。自注:“谓无酸馅气也。”^[13](第45页)所谓“蔬笋”、“酸馅”诸气,一般是指僧诗题材偏狭、篇幅偏短,多袭宗门语录、诗境清寒等特征。从《总目》的品评看,馆臣不赞成僧诗过多地沾染了僧人自身的习气,目的是从内容上维护“温柔敦厚”的儒家诗教传统。

《总目》还严格区别了诗与偈的界限。诗与偈之间的关系,也是历来人们争议的论题。拾得有诗云:“我诗也是诗,有人唤作偈。诗偈总一般,读时须仔细。”^[14](第844页)是将诗偈等同。而康熙年间所编《全唐诗》则竭力反对将诗偈相混,其《凡例》中说:“《唐音癸签》有道家章咒、释家偈颂二十八卷,《全唐诗》所无,本非歌诗之流,删。”^[15](第4页)馆臣对这个问题态度也较为明确。如评元释大圭《梦观集》:“首为《梦法》一卷、《梦偈》一卷、《梦事》一卷,次为诗六卷,次为文十五卷。所谓《梦法》《梦偈》《梦事》者皆宗门语录,不当列之集中。”^[13](卷167,第1449、1450页)又评《寒山子集》云:“今观所作,皆信手拈弄,全作禅门偈语,不可复以诗格绳之。”^[13](卷149,第1277页)馆臣这种明确区分诗偈颂的态度,也是为了维护正统的诗教观念,从形式上反对偈颂向诗歌侵袭。

《总目》对诗僧的生平、诗歌辑佚、著述版本的考证也有较大的贡献。这类考证虽不属严格的文学批评,但知人论世,以信实的材料为依据,也是历来公允品评之基础。僧人的生平,正史历来很少记载,一些僧传著述,也大多语焉不详,或神怪不经。《总目》对此作了不少清理工作。比如南宋末年诗僧文珩的诗歌,历来不见记载,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近900首,并认为“宋元以前僧诗之工且富者,莫或过之矣”。贡献不可谓不大。又,文珩与贾似道之关系,历来亦属疑案,但馆臣从其诗文中考证,认为他“非干谒之流,或似道重其名衲,游山邂逅,偶挈同游,遂题名宾从之末,亦未可定也”^[13](卷164,第1406页)。

总的来说,《总目》编撰者是站在清代统治阶级的立场上,从维护儒家思想和诗教的独尊地位出发,去评价方外诗人的诗歌创作的,这其中虽存在诸多偏颇(特别是对明遗民僧诗集之禁毁),但基本上能做到持平公允,考辨精微,代表了古人对诗僧创作的总体认识和估价,不失为我们了解、研究古代诗僧和僧诗的津梁。

注 释:

- ① 此表格惟录诗僧诗文集和僧诗选本、总集。僧人所撰之诗文评著作, 不录; 僧人所编文人诗歌总集者, 如释圆至编《唐诗说》等, 亦不录。又《唐四僧诗》,《总目》未能详录撰人, 然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已著录此书, 当为宋人所编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孙昌武. 佛教与唐代文学[M]. 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1985.
- [2] 仪平策. 中国诗僧现象的文化解读[J]. 山东大学学报, 1994 (2).
- [3] 永 瑛, 等. 四库全书总目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5.
- [4] 沈 约. 宋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1.
- [5] 皎 然. 杼山集[C]. 文渊阁四库全书: 第1071册. 台北: 台湾商务印书馆, 1983.
- [6] 刘禹锡. 刘宾客集[C]. 文渊阁四库全书: 第1077册. 台北: 台湾商务印书馆, 1983.
- [7] 余嘉锡. 四库提要辨正[C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
- [8] 吴 曾. 能改斋漫录[C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9.
- [9] 函 可. 千山诗集[C]. 四库禁毁书丛刊: 集部149册.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0.
- [10] 叶梦得. 石林诗话[C]. 历代诗话: 上册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7.
- [11] 钱谦益. 牧斋有学集[C]. 四库禁毁书丛刊: 第116册.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0.
- [12] 严 羽. 沧浪诗话[C]. 历代诗话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1.
- [13] 周裕锴. 中国禅宗与诗歌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92.
- [14] 项 楚. 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[Z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0.
- [15] 彭定球, 等. 全唐诗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6.
- [16] 汪宗衍. 天然和尚年谱[C].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3册. 北京: 北京图书馆, 1999.

(责任编辑 何坤翁)

The Critic to Monk-poets' Extra Corpora in *Sikuguanshuzongmu*

LI Shunchen¹, OUYANG Jianglin²

(1.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& Literature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 430072, Hubei, China;

2.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,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, Nanchang 330022, Jiangxi, China)

Biographies: LI Shunchen (1972-), male, Post-doctoral research fellow,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& Literature, Wuhan University, majoring in ancient poetry and lyric; OUYANG Jianglin (1974-), female, Associate professor,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, majoring in ancient poetry.

Abstract: There are 37 kinds of monk-poets extra corpora and 4 monks' poems entire corpora in Collected log of *Sikuguanshuzongmu*, which has a brief appraisal to these monk-poets' character and their works. Although there are certain bias on the critics, basically, it is evenhanded and the demonstration is subtle. As a result it can present ancient overall understanding and estimation on monk-poets writing.

Key words: *Sikuguanshuzongmu*; monk-poets; monks' poems